

修订本

项英传

王辅一◎著



项英同志
浩气长存

和吉刻



中共党史出版社

项英传

XIANGYING ZHUAN

这些落后分子，既有滑向敌人方面的可能，也有挽救回来的可能。只要我们努力争取，就有可能使落后分子回心转意，去反对敌人；把落后分子争取过来，就使敌人失掉了耳目，就会减弱敌人进攻的力量；如果把落后分子当成反动分子看待，那就是将落后分子推向敌人，正是敌人所盼望的。因此，要特别注意争取落后分子，多进行诱导和规劝，争取他们站在我们方面，切不可把他们当成反动分子看待。项英所强调的争取落后分子的原则，在巩固游击队内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国民党的报纸造谣诬蔑我们党和红军游击队是事实，但从中也可以了解情况，分析动向。例如，国民党报纸上吹嘘他们在什么地方消灭了我们多少游击队，就从反面告诉我们那个地区有游击队在活动，等于给我们通风报信。不看报，不分析，就不晓得全国的形势；不了解形势，也就不能针锋相对地同国民党作斗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赣粤边游击区》

ISBN 978-7-80023-910-6



01 >



9 787800 239106

定价：49.80元



项英传

王辅一◎著

修订本

中共党史出版社



前言

项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共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书记处书记，担任过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革军委代主席，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委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等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

然而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项英的功绩多被抹煞，在“文革”中被扣上“大叛徒”等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被说得一无是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党史资料的披露，学术界对项英功过的评述逐步有了改变。目前，尽管某些小说和文章还在贬低项英，但肯定项英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占主导地位。

鉴于对项英的看法有争议的实际情况，笔者在研究项英和撰写《项英传》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史料为依据。二十多年来，我查阅到直接或间接与项英有关的史料达数千万字。我特



别珍惜皖南事变前形成与项英有关的史料，包括当时的文件、电报、会议记录，项英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皖南事变后形成的各种史料，我注意到当时形成的历史背景，注意进行分析、比较和鉴别，并不机械地照抄照搬。

大量的史料表明，项英对人民解放事业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他长期在白色恐怖情况下，秘密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为工人的翻身解放进行了坚决斗争，参与领导了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和1927年初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在中央苏区战斗多年，为工农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壮大做出了贡献。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和陈毅等领导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持了南方的革命支点，牵制了大批国民党军，保存和造就了大批革命骨干。在抗日战争中，他和叶挺、陈毅等一起，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些，都是有史为证的。

研究与项英有关的史料，他的许多优良品质和作风会很自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第一，坚定的革命信念。项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碰到许多艰难曲折，然而他不灰心丧气，总是满怀信心地前进。他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极其艰苦的岁月中，长年在深山野林里和敌人浴血奋战，但仍然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马列书籍带在身边，有空时就读一读，从中吸取力量。第二，无私的奉献精神。项英参加革命后，公而忘私，埋头苦干，脚踏实地办事，不空说漂亮话，忠心耿耿地为革命日夜操劳。他严于律己，密切联系群众，和指战员们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第三，实事求是的、正派的作风。项英秉性耿直，刚正不阿，遇有不同意见，敢于坦诚地向组织上反映。1930年，他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时，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武汉党、团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使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所要求的武汉暴动没能举行起到一定作用。1939年，他得知蓝苹（江青）在上海时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风的不良表现，立即打电报



向党中央报告。项英上述优良品质和作风，都是难能可贵，值得珍视、学习和发扬的。

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项英自然也不是足赤之金，他在革命过程中也是有缺点、错误的。例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执行过“左”的错误路线，提出过“左”的口号，指挥过红军力不胜任的战斗。在抗日战争中，他对华中战略地位的认识不够，对向北发展的自觉性不够，措施不够有力，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不够，对合法的手续、方式考虑多了，对自主的发展强调不够，结果使一些部队和地区受约束多，影响到活动和发展；特别是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警惕不够，对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应迅速撤至江北指示的执行迟迟下不了决心，使转移丧失有利时机，加之在转移途中处置失当，因而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的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但是，尽管如此，并不能否认项英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对于一个历史人物，“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①笔者认为，这一对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是非常正确的，当然适用于评价项英的一生。

1998年5月13日，项英诞辰百年纪念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他作了重新评价，称赞“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②，对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

项英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在革命征途中功大于过，他创立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② 见1998年5月14日《人民日报》要闻版。



项英传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1
一 贫寒家庭	1
二 学徒生涯	2
三 办工人俱乐部	4
四 入党前后	10
第二章 投身工人运动	15
一 发展武汉工会	15
二 参加党的“二大”	17
三 推动铁路工运	20
四 在二七大罢工中	24
五 参加党的“三大”	34
六 沪西二月罢工	37
七 参加党的“四大”	43
八 转战上海、武汉	45
九 参加党的“五大”	53
十 参与中央常委领导	55



十一	参加党的“六大”	58
十二	全总领导岗位	65
十三	准备武汉暴动	76

第三章	在中央苏区	85
一	奉命进入中央苏区	85
二	正确对待富田事变	92
三	“一苏大”召开前后	102
四	为扩大苏区出力	112
五	加强人民政权和苏区建设	124
六	在军委领导岗位上	136
七	“二苏大”召开前后	150

第四章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57
一	掩护主力转移	157
二	转变斗争方式	168
三	突出重围	175
四	分兵游击	184
五	反“清剿”	191
六	巩固内部	206
七	游击新特点	215
八	新的考验	222
九	实行谈判改编	236
十	同党中央恢复联系	253
十一	向党中央汇报	261

第五章	战斗在新四军	271
一	党中央决策过程	271
二	编组前后	281
三	向敌后挺进	290
四	坚持皖南抗战阵地	303
五	参加六届六中全会	310



六 到苏南敌后巡视	323
七 发展方针的实践者	329
八 加强政治领导	343
九 治军抓重点	358
十 发扬优良传统	367
十一 外援的积极争取者	375
十二 项、叶之间	384
十三 东南地区党的工作	393
第六章 在皖南事变中	407
一 局势的逆转	407
二 北移的变化	411
三 北移路线的波折	422
四 北移的准备	428
五 北移途中	436
六 最后两个月	447
七 沉痛的教训	457
八 仓促的决定	469
第七章 殉难之后	479
一 评价跌至谷底	479
二 重新安葬	483
三 实事求是推动评价回暖	486
四 纪念诞辰百年	491
五 历史原貌逐步恢复	497
后 记	511
又 记	517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一 贫寒家庭

项英，原名项德隆，又作德龙、飞龙，化名江钧、张成、韩应、江俊，笔名夏英，1898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一个职员的家庭里。

项德隆的祖籍是武昌县舒安乡项家村。祖父因会种花、植盆景，就由乡下搬到武昌城涵三宫落户，以种植花卉为业，当地人曾称他家是“项家花园”。父亲项天卫是县里管理钱粮簿册的职员，为人忠厚老实。母亲夏氏，善良能干。项德隆有二兄一妹，自己排行老三。

项德隆七岁那年，开始进入武昌育才小学读书。他聪明伶俐，学习刻苦，作业认真，还很注意练习小楷毛笔字。几年后，当他看到父亲忙得不可开交时，就经常利用课外和晚上时间，帮助父亲誊抄钱粮簿册。这就减轻了他父亲的劳动负担，很得他父亲的欢心。由于那时常写常练，使他逐步练就了一手漂亮的行书字，同时从这早期的劳动实践中，学到了办事要认真仔细、一丝不苟。

项德隆十二岁那年，小学毕业，父亲不幸早亡，家境迅速恶化，仅靠母亲纺织、刺绣和帮人洗衣等所得的微薄收入来糊口。他为了帮助家庭维持生活，不得不放弃读书，寻找职业，先是想进商店当学徒，后又想进工厂当学徒，但三年却找不到工作。

家庭的困难生活，恶人的作威作福，善良劳苦大众累死饿死的悲惨遭遇，所有这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给少年的项德隆思想上以



很大的刺激，也促使他早些成熟。

当时，项德隆的叔父项仰之任武昌慈善会会长，有钱有势。但项德隆很有骨气，人穷志不短，不和他叔父家来往。

有一天，项德隆的亲友看他家的日子过得艰难，劝他找项仰之求情，给些帮助。这也是好意。而坚强的项德隆却宁肯饿肚子，也不愿意去找项仰之求情。他联系到叔父的日常为人，对劝他的亲友说，项仰之是个吃人的恶棍，欺压老百姓的魔王，不能和这种人打交道。

项德隆这段话，项仰之听说后很是恼火，骂项德隆是个“不孝之子”。

项德隆却理直气壮地对人们说：对那些骑在人民头上欺压人民的人，不仅不能孝，而且还要打倒他们。

这表明，年少的项德隆对旧社会、对有钱有势人家的仇恨之心是很深的。

1911年，也就是项德隆十三岁那年，爆发了辛亥革命。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发动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1912年元旦，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这场革命，给项德隆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个人只不过是剪掉了一条辫子，但“革命”二字的观念对他却是有一定影响的。

少年时期的项德隆，给他的乡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和他同桌读书三年的黄凤梧老人，在七十年后回忆项德隆少年的情景时，形容他是：“读书很聪明，外表文秀，内怀大志。”^①

二 学徒生涯

1913年，已经十五岁的项德隆费了很大周折，才考入武昌城模范大工厂（纺织厂）当学徒。当时，学徒收入十分微薄，生活很苦，还经常挨打受虐待，受到不少折磨。项德隆为了生活，只好将苦水暂时吞咽下去。三年满师后，他年已十八岁，留在厂里当

^① 中共武昌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武昌党史资料》第6期，1984年9月26日。



工人。

这时，项德隆的妹妹项德芬也成为一名纱厂工人。后来，项德芬在项德隆的影响下，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工人运动中去。

1917年冬，项德隆从《汉口新闻报》上得知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受到很大的鼓舞。他联系自己和工友们身受中外资本家盘剥和工头欺凌的情景，心想：俄国工人阶级能起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工人阶级也应该和能够起来革命，打倒资产阶级。从此，他心中便开始向往着革命了。

1919年5月初，报纸上刊登消息，披露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向日本索回胶州湾权利的要求遭到拒绝的情景。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高举“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等字样的旗帜，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全国各地工人和各界人士深表同情，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这对项德隆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当年，董必武、陈潭秋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武汉办起工人夜校，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项德隆在这所工人夜校学习，提高了革命觉悟，开始懂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开始懂得工人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本原因，较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明白了工人要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改善生活待遇，就要靠自己团结起来去争取。他决心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出力，参加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斗争。

从那时起，项德隆便在自己所在的模范大工厂中，自发地从事工人运动。开始，他只在少数工人中秘密活动，后来逐步扩大到几十个人。

1920年4月，项德隆利用本厂工人受工头虐待和工资低微的不满情绪，选择有利时机，成功地发动了一次罢工。当时，棉布在市场上畅销。工人们的罢工停产，直接影响到资本家的利益。停产愈久，影响就会愈大。资本家对工人的罢工感到震惊，怕罢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事态进一步扩大，影响生意，被迫很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给工人赔礼道歉，将工人痛恨的工头开除出厂，并给工人增加了工资，还答应要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



项德隆领导的模范大工厂工人的罢工要求得到了满足，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武汉纺织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斗争。它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工头再不敢随意打骂工人了。

这次罢工的胜利，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工头的压迫是一次沉重打击。它使工人们扬眉吐气，激励起反抗剥削、压迫的热情，看到了工人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纷纷参加工会。于是，在项德隆的领导下，模范大工厂迅速组织起全厂性的工会。

项德隆第一次领导罢工斗争的胜利尝试，使他大大提高了开展工人运动的信心，增强了同资本家作斗争的勇气。

三 办工人俱乐部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它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强调党要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决议》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工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合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① 根据“一大”决议的精神，中共中央于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部机关，并出版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②。

同年10月，出席中共“一大”代表、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包惠僧返回武汉，奉中共中央指示，组织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不久改为武汉分部），并兼分部主任，以便在武汉地区开展劳动组合的工作。同时，在武昌察院坡的时中书店，建立《劳动周刊》武汉发行处，以广泛宣传劳动组合的主张。项德隆作为《劳动周刊》的热情读者，时常到那里去阅读进步书刊，增长了知识。

同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影响到京汉铁路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②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按：新中国建立前曾称平汉铁路)工人，他们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江岸铁路机车工人还要求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派人去领导他们。为了推动江岸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包惠僧和李汉俊（原为上海党组织成员，此时来汉口任市政府督办公署总工程师）、陈潭秋（武汉党组织成员）等商量，确定尽快派人组织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他们经过物色，但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就在包惠僧着急的时候，项德隆写去了信，说他从《劳动周刊》上得到消息，希望参加工会工作，并要求当面谈谈。这使包惠僧喜出望外，于是立即复信，约项德隆在本星期天下午一点到武昌黄土坡十六号寓所面谈。项如约按时前往，两人热情交谈起来。

通过这次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谈话，包惠僧对项德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他很不平凡，有思想，有抱负，特别对工人运动表现出很高的热情，非常高兴^①，心想：如果各厂的工人都和项德隆一样，那工作就好做了。临别前，包惠僧送给项德隆新出版的《两个工人谈话》等小册子，并约他下一个星期天下午再专门来谈一谈关于模范大工厂的工人情况。

到了下一个星期天，包惠僧刚吃过午饭，项德隆就来到了。一见面，他就笑嘻嘻地对包惠僧说：您给我的书，我都看过了。接着，详细地介绍了模范大工厂工人的情形，并简单地说明了其他纺织厂的情况后，直爽地说：“我一直是被关在模范大工厂内，外面的情形知道得不多，不过因为自己是个工人，知道一些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劳动周刊》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这都是工人迫切的要求。如何实现这个要求呢？我愿跟你们共同努力，怎样做法，我还提不出具体意见。”^②

包惠僧第一次同项德隆谈话以后，就想吸收他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派他去筹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出于慎重起见，再次进行考察，并派别人同他接触和考察。经过多方面的了解，包惠僧认定项德隆是一个纯洁天真、有作为的青年工人，是

①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② 《包惠僧回忆录》，第386页。



一个理想的对象。

包惠僧把要吸收项德隆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并派他到江岸工作的打算正式告诉了他，还说明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负担他的生活费。

项德隆听说要吸收他参加工会工作，非常高兴，心想这正符合他为工人谋福利的愿望。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包惠僧考虑项德隆是个经过三年学徒的工人，抛弃熟练的职业是件大事，要他最好回家和母亲商量一下。

项德隆豪爽地表示：“选择职业我完全有自由，我没有把纺织工作作为终身事业来打算。党相信我，需要我出来工作，我很高兴，完全听从组织分配。”^①

项德隆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的态度，使包惠僧感到高兴。

江岸位于长江北岸，是京汉铁路南段一个大的铁路地区，有车站、机务段、车辆厂、修理厂、材料厂等单位，和长辛店、郑州一样同为总段。这里居住着三千多名工人，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压迫和剥削甚为不满。因此，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当时确定把建立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作为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一个重点来抓。

几天后，包惠僧邀请江岸铁路各帮口的工人领袖杨德甫、林祥谦等座谈，商量筹建工人俱乐部的事宜，并将要派项德隆来工作的事告诉他们，他们都表示欢迎。经过商量确定，成立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筹备处设在江岸龙王庙，项德隆为筹备处文书。这是他从事革命活动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1921年12月，项德隆离开模范大工厂，前往江岸龙王庙，担当起筹建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重任。从此，他开始了职业工人运动的生涯。

没过几天，项德隆迅速挂起“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招牌。这是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公开活动的开始。

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招牌挂出后，引起各方面的注视。

一天，林祥谦把组织工人俱乐部的事，告诉车辆厂法国厂长杜

^① 《包惠僧回忆录》，第386—387页。



拉克，以探听他的态度。这个厂长说：工人俱乐部在法国是极平常、极普遍的事，俱乐部的活动是合法的。这样，俱乐部的牌子就很顺利地挂起来了。

项德隆在江岸铁路工人中，积极地进行发动，广泛地进行联系，深入地宣传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的《劳动法原则》等主张，包括：保障工人政治上的自由，提高工人的工资福利，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保护女工、童工的合法权益，等等，深得工人的信任和拥护，许多工人称他为“项先生”。

那时，铁路工人中帮口很多，如福建帮、广东帮、安徽帮、山东帮、湖北帮等。这些帮口是进行劳动组合工作的很大障碍，选择筹备人员不得不照顾帮口的关系。工人俱乐部筹备处的人员，经过反复协商才产生出来。筹备处干事杨德甫，管庶务的周天元，是湖北帮的；干事林祥谦，管财务的张连光，是福建帮的；干事黄桂荣，工人骨干曾玉良，是江南帮的。项德隆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把调整各帮口的关系，用阶级教育来消灭帮口的成见，当作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反复向大家说明，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联合在一起才有力量的道理。这样，逐步消除了帮与帮的矛盾，为工人俱乐部的成立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项德隆和各帮口的工人领袖杨德甫、林祥谦、曾玉良等相处得很好，通过他们作骨干进行宣传和串连，使工人逐步了解到俱乐部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知道成立俱乐部的好处。工人们通过和项德隆的交往，知道他的情况后，普遍愿意接近他，要求参加工人俱乐部的也越来越多，报名非常踊跃。

项德隆把工人俱乐部办得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有象棋、围棋，有演唱，有讲演，有打乒乓球、篮球等活动。这些形式，工人喜闻乐见，有益于他们身心健康，很有吸引力，成为广大工人晚上常去聚会的场所。他在组织俱乐部活动的过程中，常和工人一起下棋、交谈，进一步密切了同工人的关系，了解到工人的情绪和要求。

项德隆还办起一所工余夜校，自己担任教员，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同时讲工人的悲惨遭遇，讲帝国主义、军阀的剥削压迫是造成工人生活贫困的根源，讲工人斗争的历史，讲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斗



争的意义，使广大工人提高了阶级觉悟，逐步懂得受压迫的原因，从内心里发出“要当家作主，不再当牛马”的呼声，鼓励工人团结起来开展斗争，争取改善工人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

项德隆在开展工人俱乐部的活动中，很重视做小工的工作。当时在产业工人中，翻砂匠、打磨匠之类的工匠地位比较高，一般被称为师傅，工资也较多；最苦的要算是小工，他们工资少，劳动活重，还要听工头、工匠的差使，时常挨打挨骂，生活最没有保障。自从工人俱乐部组织起来以后，小工与工匠、工务员、工程师都坐在一起开会，或一起下棋、唱戏、打球，无形中提高了小工的地位，因而小工对工人俱乐部信仰很高，参加工人俱乐部最积极，办理登记手续、缴纳会费最踊跃。项德隆通过工余夜校，对小工进行阶级友爱的宣传教育，把小工团结在工人俱乐部的周围，把工人的大多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坚强的政治力量。

1922年1月22日，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在老君殿举行成立大会。

那一天细雨蒙蒙，天气很冷，然而老君殿却像办喜事一样，热闹非凡，各厂的工人除值班者外几乎都到了，郑州、信阳、驻马店等站的工人代表，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的代表，粤汉铁路徐家棚段的工人代表，包惠僧作为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李汉俊作为武汉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都应邀参加。许多工人还把他们的厂长也邀请来参加大会。会场正中悬挂着对联，右面是“机器巧夺天工”，左面是“劳动创造世界”，横幅是“劳工神圣”^①。这副对联吸引着到会的工人群众。

这天上午10时，会议主席杨德甫宣布会议开始；项德隆报告了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的筹备经过，讲述了成立工人俱乐部的重要意义和工人俱乐部的性质、任务；包惠僧作了《新文化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报告，热烈祝贺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的正式成立，介绍了全国各地工人组合的情况；李汉俊作了《日本劳动组合情况和中国人组合的步骤》的报告，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争取工人基本权利而斗争。会议通过了组织公约，宣告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

^① 《包惠僧回忆录》，第95页。